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曾永義 主編

十七編 第 19 冊

富教並重，教化至上

李綠園教育思想及其《歧路燈》創作觀念研究（上）

徐雲知 著

花木蘭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七編

曾永義主編

第19冊

富教並重，教化至上——李綠園教育思想及其《歧路燈》創作觀念研究（上）

徐雲知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富教並重，教化至上——李綠園教育思想及其《歧路燈》創作觀念研究（上）／徐雲知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民 107〕
目 2+140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七編；第 19 冊）
ISBN 978-986-485-336-6（精裝）
1.（清）李綠園 2. 古典小說 3. 文學評論
820.8 107001708

ISBN-978-986-485-336-6
9 789864 853366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七編 第十九冊 ISBN：978-986-485-336-6

富教並重，教化至上
——李綠園教育思想及其《歧路燈》創作觀念研究（上）

作　者 徐雲知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王筑　美術編輯 陳逸婷
出　版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8 年 3 月
全書字數 327249 字
定　價 十七編 26 冊（精裝）新台幣 5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富教並重，教化至上——
李綠園教育思想及其《歧路燈》創作觀念研究（上）

徐雲知 著

作者簡介

徐雲知，女，1965 年生人，祖籍山東文登，北京西城教育研修學院教研員。1988 屆哈爾濱師範大學教育學學士、2001 屆首都師範大學教育學碩士、2005 屆文學博士。

1992 年破格晉升講師，1996 年獲黑龍江省綏化地區「教育行業女狀元」稱號，1998 年拔尖晉升高級講師，2008 年入選「北京市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2005 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學術專著《語感和語感教學研究》被教育部選爲新基礎課程教師培訓教材，2012 年由教育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原來他們這樣做校長：北京西城智慧校長訪談錄》作爲精品書由《中國教育報》和《中華讀書報》向全國推介。

提　要

在十八世紀的中國，與《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幾乎同時產生的還有一部《歧路燈》，它是李綠園耗時 30 年撰寫而成的我國古代第一部長篇白話教育小說，是浪子回頭題材的集大成者。

浪子得以滋生的土壤是經濟的繁榮，康乾盛世因經濟繁榮而滋生的浪子成爲當時的社會問題。李綠園以其作家敏銳的觸角將浪子出現與經濟繁榮聯繫起來，明確提出「富教並重」、「教化至上」的思想，顛覆了千百年來儒家以孔子爲代表的「先富後教」的思想觀念，給予經濟繁榮時期的教育以準確的定位。

本研究在吸納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將文學考證和歷史考證研究相結合，從讀者論、時代論、作家論及創作實踐論四個維度切入，既關注小說文本意蘊的闡釋，也關注作家生平遭際對其創作的影響，更關注康乾盛世經濟繁榮對教育的影響，進而對李綠園創作觀念的成因、《歧路燈》文本意義的構成以及經濟繁榮與人才培養二者之間的關係進行探析和論證，從而揭示《歧路燈》的意義不單純是李綠園對文學的理解和詮釋問題，也是其對教育的價值判斷與理念支撐問題，更是經濟繁榮時期如何定位教育的問題，以此透視《歧路燈》於康乾盛世文學意義、教育意義、經濟意義、社會意義的構成，在人文反思和重構社會文化語境中尋求文學理解與教育理解的普遍性，以期在經濟迅猛發展的當代，尤其是爲解決改革開放近 40 年來出現的「肚子飽了，眼睛亮了，靈魂卻餓著」的現實問題尋求可資借鑒的參照系統。

本研究試圖突破學界的既有研究窠臼，從知人論世的傳統思路入手，也在這一環境背景中闡釋李綠園《歧路燈》的文本意蘊，最大限度地還原作家的創作觀念及其小說的文本涵義，以期匡正時誤舊說，推陳出新，進而揭示出教育是一個由學校、社會和家庭組成的綜合影響系統，全面地對受教育者施加教育影響，教育的內容與形式要與個體的發展與時代的要求相適應，方能達到培養人的目的。

爲了更好地進行本研究，筆者根據保存下來的李綠園的全部作品、結合自己視野所及範圍內獲得的與此相關的文獻資料作爲參照，對李綠園生平、交遊、卒地和《歧路燈》版本、傳播問題進行考證，附錄在後，以備參考。



目次

上　冊

引　論……1

第一部分：讀者論……3

教育小說和《歧路燈》研究概述……5

第一節　教育小說與李綠園的《歧路燈》……5

一、教育小說釋義……5

二、教育小說與其他小說的區別……10

三、教育小說的題材流變……14

第二節　李綠園及其《歧路燈》研究概述……19

一、《歧路燈》在文學史和教育史上的地位……19

二、李綠園及其《歧路燈》的研究歷程……20

三、本研究的思路與方法……40

第二部分：時代論與作家論……45

李綠園的創作觀念及其成因……47

第一節　李綠園創作觀念的時代成因……47

一、康乾盛世的經濟與文化……48

二、康乾盛世的社會風氣……62

第二節　李綠園的家世及其社會角色……87

一、李綠園「以孝相踵」的家世……88

二、道學家、師者和循吏的社會角色……100

第三節　李綠園以小說行教化的創作觀念……113

一、李綠園對儒家傳統「文以載道」的繼承……114

二、李綠園對創作主體「文行出處」的要求……118

三、李綠園對「以小說行教化」的內容擇揀……119

四、李綠園對「以小說行教化」的形式選取……124

五、李綠園「教化至上」文學創作成因解析……132

下　冊

第三部分：創作論……141

《歧路燈》：基於教化的藝術實踐……143

第一節　《歧路燈》中的教育思想……144

一、李綠園的哲學基礎：人性「近」論……144

二、李綠園的教育目的：「學爲聖人」……149

三、李綠園的價值取向：「富教並重」「教化至上」……155

第二節　《歧路燈》中的教育對策 ……156
一、《歧路燈》中「用心讀書，親近正人」的頻次 ……157
二、《歧路燈》中的「聖賢」之書及「方正」之人 ……160
三、《歧路燈》中來自社會和家庭的教育影響 164
第三節　《歧路燈》中的教化內容 ……187
一、治世：理學爲體，實學爲用 ……188
二、治吏：反腐倡廉，勤政愛民 ……196
三、治家：尚德尚貞，尚孝尚工 ……207
第四節　《歧路燈》中的教育形式 ……218
一、官學爲主：科舉指向，徒有虛名 ……218
二、私學爲輔：蒙養訓練，專經研習 ……226
三、書院補充：官學傾向，多攻製藝 ……229
結　語 ……233
第四部分：附錄 ……237
李綠園及其《歧路燈》文獻研究 ……239
【附錄一】　李綠園年譜 ……239
【附錄二】　李綠園交遊考 ……293
【附錄三】　李綠園卒地考 ……320
【附錄四】　《歧路燈》版本考 ……326
【附錄五】　《歧路燈》傳播考辨 ……333
參考文獻 ……345

引　論

曾幾何時，人文社科領域裏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無不被人們思考過，我們所能做的僅僅只是重新加以思考而已；正是這種「重新思考」使我們的思想顯得與前人不同，原因在於：一方面，就知識積累而言，我們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另一方面，就研究視角和研究方式而言，我們既轉換了時空視角也更新了研究的路徑與方法。李綠園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基於此。

一部文學作品不單要看它用什麼樣的形式來反映生活，還要看它反映了什麼樣的生活；不但要看其內容與形式的背後支撐作家創作的動機和理念，還要看其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作家的創作動機和理念。不僅如此，還要將作家置身於其所處的時代這個大座標系之中，無限還原其所處的時代及其生平遭際，看時代對其本人及其作品的影響及其本人與其作品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住了時代的脈動，以明確其社會意義與價值何在。一部《歧路燈》反映的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富」與「教」的關係問題，即在社會經濟高度發展的時期教育應該承擔什麼樣的社會功能問題，這個問題需要明確回答和妥善解決，尤其是上個世紀改革開放後直至今天的中國，顯得尤爲重要與迫切。李綠園在康乾盛世基於文學命題闡釋的經濟繁榮帶來的社會問題與教育問題，對於今天解決「富」與「教」的關係問題，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

研究李綠園離不開《歧路燈》，儘管李綠園在當時是以詩名〔註 1〕而被世人認知，但其對後世影響最大的卻是他的《歧路燈》。一部《歧路燈》總體而言是李綠園賦意、文本傳意、讀者和批評家釋義的複合共同體。本研究先從

〔註 1〕《國朝中州詩鈔》因收錄其詩作，《中州藝文錄》遂爲其立傳。

「教育小說」概念的界定入手，試圖對作者賦意的內外影響因素和文本的意義構成二者之間的關係進行探討和論證，進而揭示《歧路燈》的意義不單純是李綠園對文學的理解和詮釋問題，也是其基於經濟繁榮背景下的教育價值的判斷問題與教育理念的支撐問題。在研究過程中筆者將對《歧路燈》給予格外的關注，並以此透視中國十八世紀文學意義與教育意義的構成，以期在人文反思和重構社會文化語境中尋求文學理解與教育理解的普遍性，以期在經濟迅猛發展的當代，尤其是爲解決改革開放近 40 年來出現的「肚子飽了，眼睛亮了，靈魂卻餓著」的現實問題尋求可資借鑒的參照系統。

李綠園及其《歧路燈》是清代的作品。無論是李綠園，還是李綠園所處的時代，無論是作爲文本的《歧路燈》，還是《歧路燈》所展示的內容均屬於歷史。無論我們想從時代方面，還是從作家方面還原歷史，我們都只能無限地接近作家所處的時代和作家本身，時空的距離已經使我們無法再現當時的歷史的眞實。雖然歷史本身所具有的本原的眞實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變的，但時空距離所造成的主觀偏見和誤解是顯見存在和無法消除的。這也意味著我們今天對歷史的詮釋不可避免地要帶有很大程度上的主觀性，「《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註 2〕」。但是，眞正的理解不是克服歷史的局限，而是尊重人的存在的歷史性，在無限接近歷史眞實的同時，從中接受正反兩方面對於我們今天可以借鑒的東西，並把它們解釋成我們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納入到我們的價值體系。歷史既是理解的前提，又是理解的產物；理解是一種創造性的過程，被讀者理解的文本內容是文本在歷史中表現出來的東西，它遠比作者想要表達的東西多得多。

如果我們以時間爲橫軸以空間爲縱軸做一個座標系，那麼李綠園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座標系，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另一個旋轉了的座標系，兩個座標系之間又有許多個旋轉程度不同的座標系。儘管這些座標系不同，但這些座標系共同擁有一個原點，那就是李綠園及其作品。與李綠園同時代的讀者以及其後的讀者，都和我們一樣，處於座標系之中；位置不同，看原點就存在各種各樣的差異，而這種差異的本身構成了解讀李綠園及其文本的審美系統，讓我們領略到李綠園及其作品獨特的藝術魅力的同時，深刻地思考相似的語境賦予我們的共同理解與價值追求。

〔註 2〕 董仲舒，春秋繁露，精華〔M〕。

第一部分：讀者論

教育小說和《歧路燈》研究概述

《歧路燈》的主題表面上是一個因家庭富裕生發出來的「浪子回頭」的老生常談的題材問題，近五十年來關於《歧路燈》的題材定位一直眾說紛紜：研究者或以家庭小說命名之，或冠以諷刺小說，或稱之爲世情小說，或認爲勸誡小說等等。究竟《歧路燈》當屬小說文體中的哪一種題材，本研究同意將其定位爲教育小說，並從教育小說釋名、教育小說與其他小說的區別以及教育小說題材的流變三個方面來探討《歧路燈》的題材定位問題。

第一節　教育小說與李綠園的《歧路燈》

一、教育小說釋義

（一）什麼是教育

教育的日常概念有三類，一類表明教育是一種深刻的思想轉變過程，一類是作爲方法的教育，還有一類是作爲一種社會制度的教育。英語中的「教育」（education）最早起源於拉丁文 educare，意思是採用一定的手段把某種本來就潛藏於人身上的東西引導出來，即將一種潛在的素質轉變爲現實素質。在我國，「教育」一詞最早見於《孟子・盡心上》中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但這兩個字在當時並無一個確定的含義，倒是《禮記・學記篇》中的「建國郡民，教學爲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學」可以作爲「教育」的緣起。

在所有的教育釋義中，《說文解字》對「教育」的釋義最爲精準，體現了我們傳統文化的精髓：「教，上所施，下所效；育，養子使做善也。」

「教，上所施，下所效」，說明教育重在傳承族群文化，縮短人類個體適應社會的時間，加快社會化進程。中國最早擔任教職的是官史（中國古代的教育傳統是「官師一體」）和族群中德高望重的年長者，「施」，是示範、引領，言傳身教；「效」，是模仿、學習，卓有成效。將族群文化以社會規範的形式傳遞給年輕一代，上施下效是爲教。

「育，養子使做善也」。說明教育是一種社會活動，重在傳承族群文化，而文化的核心是族群普適的價值觀念，這種價值觀念是善，「做善」裏面蘊含著「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良好願望。

科學概念的「教育」一般從兩個方面來定義：

從社會角度可以將教育分爲廣義的教育和狹義的教育：凡是增進人們的知識和技能、影響人的思想品德的活動都是廣義的教育；狹義的教育則主要指學校教育，即教育者根據一定的社會或階層的要求，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對受教育者身心施加影響，把他們培養成爲一定社會或階層所需要的人的活動；更狹義的教育有時單指思想教育即德育。社會角度的定義方式強調的是社會因素對個體發展的影響，把教育當作社會的一部分，承擔著一定的社會功能。

從個體角度定義的教育往往將之等同於個體的學習或發展，有的研究者曾把教育定義爲「成功地學習知識、技能與正確態度的過程」，這裡的學習內容應是值得學習者爲之花費時間與精力的學習內容，學習方式則一般應是學習者能通過所學知識表現自己的個性，並將所學知識靈活地應用到學習時自己從未考慮過的境遇與問題中去。個體角度定義的出發點和基礎是學習和學習者，側重教育過程中個體各種心理需要的滿足和心理品質的發展。

由以上兩種定義方式可以確認：教育是一定社會背景下發生的促進個體的社會化和社會的個性化的實踐活動。所謂個體的社會化，是指根據一定社會的要求把個體培養成爲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具有一定態度、知識和技能結構的人；所謂社會的個性化，是指把社會的各種觀念、制度和行爲方式滲透到需要、興趣和素質各不相同的個體身上，從而形成他們獨特的個性心理結構。個體的社會化和社會的個性化是教育這一實踐活動的兩個方面，二者互爲前提、密不可分。這種定義方式在描述了教育的活動性同時指出教育是個體的社會化和社會的個性化的耦合過程，強調了教育在個體的社會化和社會的個性化的過程中所起的促進或加速作用，並強調教育行爲發生的社會背

景，強調教育與一定的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條件之間的聯繫，從而說明教育活動的社會性、歷史性和文化特徵。構成教育的基本要素有三個，即教育者、學習者和教育影響，三者缺一不可。

（二）什麼是小說

「小說」二字最早見於《莊子・外物篇》:「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大達」即大道，指博大精深的學說，「小說」則指無關大道的觀點和言論，這裡的「小說」只是組合成詞，不具有文體意義。《漢書・藝文志》中有「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議，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採，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可以看作是「小說」的緣起。但《漢書・藝文志》對小說的評價並不高：「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弛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可見小說被摒棄於「可觀者九家」之外，是與「通萬方之略」不相干的東西。

「小說」中的「小」字，一方面說明它在文化品位上屬於「小道」；另一方面說明它在文體形式上的表現形態是「殘叢小語」，漢桓譚《新論》中有「小說家合殘叢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小說」中的「說」字，有三層意思：一爲文體形態層面的「說故事」或「敘事」（見《韓非子・說林》、《韓非子・儲說》）；二爲表現形態層面的「解說」，漢許愼《說文解字》有「說，釋也」；三爲功能形態，有「喜悅」、「娛樂」之義，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說釋，即悅懌。說，悅；釋，懌；皆古今字。許書無悅懌二字。說釋者，開解之意，故爲喜悅」〔註1〕。

小說在發展過程中有兩次質的飛躍，一次是唐代，一次是明代。在唐代，小說的構成形態出現了文人的詩心靈性與多重文化和多種文體因素的融合，所謂唐人「始有意爲小說」（魯迅語）即指這種文體構成形態融合的自覺程度和成功程度，唐代小說已「文備眾體」；在唐宋兩代出現了書面文學和民間口傳文學方向相反的融合與離析，以唐傳奇爲標誌的書面文學與文人文化的融

〔註1〕參見：楊義，楊義文存（卷六，《中國古典小說史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頁1～5。

合，提高了小說的審美檔次，以宋元說話爲標誌的民間口傳文學與民間文化和宗教文化的碰撞而離析，拓展了小說發展的前景。因此胡應麟《少室山房筆記・九流緒論》說：「小說，唐人以前，記述多虛，而藻繪可觀；宋人以後率俚儒野老之談故也。」明代以降，文人參與小說創作，以「四大奇書」和「三言」「二拍」爲代表的第二次融合直接指向雅文化和俗文化層面，使民間文學、文人文學和外來宗教文學在廣度和深度方面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近代，小說的教化功能被提到一定高度，有矯枉過正之嫌。有例爲證：一是鴉片戰爭後，個別冬烘文人主張將「誘壞身心性命者，業力甚大」者如《紅樓夢》等「淫書，移送海外，以答其鴉片流毒之意」，用毒如鴉片的「淫書」到英國去「誨淫」，目的是「使其人淫、使其國亡」〔註 2〕；二是太平天國時期，廣東官紳的應急措施是趕印《蕩寇志》，雖然目的是「以自勸懲」，但「厥後漸臻治安」被認爲是「是書之力也」〔註 3〕，也就是說《蕩寇志》不但保住了城池，而且還平息了匪亂；三是戊戌變法人士如梁啓超者在維新受挫、救國無路、救民乏術的困境中發現外國的政治小說在富國強民中積極的先導與催化的作用，因此認爲「今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註 4〕。且不論上述三例的可行性，僅此可見小說功能被重視的程度。因此嚴復、夏曾佑指出：「夫說部之興，其入人之深，行世之遠，幾齣於經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風俗，遂不免爲說部之所持」〔註 5〕，即明確提出要注重小說的社會教化功能。

小說，作爲文學的一大類別，作爲敘事性文學體裁之一，其成熟的標誌應包括三個要素：就表現形式而言，其主體應爲散文，但並不排除用一定的韻文寫景、狀物與議論；就其內容而言，它要有一定的故事情節，從而與文學散文有明顯的區別；就構成其故事情節的性質而言，它應當是虛構的，或基本上是虛構的；此外，文學語言的自足性也是小說的一個特徵。作爲小說，一般具有教化、娛樂和審美的功用，而它的功用以它的故事性、通俗性爲前提〔註 6〕。

〔註 2〕〔清〕毛慶臻，一亭考古雜記〔A〕，民國十六年（1927）影印本。
〔註 3〕〔清〕錢湘，續刻《蕩寇志》序，清同治七年刻本。
〔註 4〕梁啓超，論小說與群治的關係〔J〕，新小說，1902，第 1 號。
〔註 5〕嚴復、夏曾佑，本館附印說部緣起〔J〕，國聞報，1897。
〔註 6〕參見：馬振方，小說藝術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8～11。

（三）什麼是教育小說

「教育小說」這個概念最早來自德語 *Bildungsroman* 一詞，又可稱爲「成長小說」或「性格發展小說」，歌德的《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和《威廉・邁斯特的漫遊時代》以及凱勒的《綠衣亨利》均被認爲是教育小說的典範之作，從這三部作品的內容不難發現，所謂的「教育小說」均與一個人的成長（或性格形成時期的生活）歷程相關，「追溯一個年輕人的成熟歷程：自反叛到認同社會規範」，具「有某種教寓和懲戒性質」〔註 7〕。茨維坦・托多洛夫的《批評的批評——教育小說》並非嚴格意義上的教育小說，它只是沿用了「教育小說」的傳統內涵來敘述托多洛夫本人是怎樣從一個保加利亞「文學理論家」轉變成「形式主義者」、「結構主義者」，又轉變成「對話批評的提倡者」這樣一個思想變化、成長過程〔註 8〕。

在中國「教育小說」古已有之，但對此概念尚無準確的界定。1904 年創刊的《新新小說》和 1906 年創刊的《月月小說》都使用過這一概念。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後期才有研究者給「教育小說」下定義，認爲教育小說是「中國古代小說的一種題材分類」；「它是以人物形象、故事情節等等組成的小說的藝術形式形象化地反映培養兒童、青少年準備從事社會生活的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家庭教育等教育活動的小說類型」〔註 9〕。對這個定義，筆者認爲：

其一，教育小說是「小說的一種題材分類」。「教育小說」，顧名思義，「教育」界定的是題材，是內容；「小說」框定的是體裁，是形式；離開了「教育」題材（內容）的小說不是「教育小說」，同樣，離開了「小說」體裁（形式）的教育題材也不是「教育小說」，作爲「教育小說」要同時兼有教育和小說的基本要素和一般特徵方能稱之爲「教育小說」；

其二，對教育小說要有明確的時空範疇界定。對「教育小說」在時段範疇的界定上不能只局限於「中國古代」，因爲中國現、當代也有教育小說；何況「中國古代」嚴格意義上的教育小說並不多見。另外，教育小說在空間範疇的界定上也不能只局限於「中國」，外國也有教育小說，法國盧梭的《愛彌爾》、瑞士裴斯泰洛齊的《林哈德與葛篤德》等都是教育小說。一般說來，對

〔註 7〕〔臺灣〕大美百科全書（第二十卷）〔Z〕，光復書局，1991，頁 375。

〔註 8〕參見：〔法國〕茨維坦・托多洛夫，批評的批評——教育小說〔M〕，北京：三聯書店，2002。

〔註 9〕李延年，歧路燈研究〔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頁 3。

於一個概念定義時其外延的界定要有普遍適用性，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對「教育小說」的定義。

其三，概念外延界限要明確。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不是可以並列的概念，它們之間在科學意義上的範疇關係應該是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從屬於社會教育，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是社會教育這個大概念之內的兩個類屬概念。廣義的教育就是社會教育，它包括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狹義的教育指學校教育，將社會教育看作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外的教育是不確切的。日常約定俗成的社會教育僅僅是從空間的範疇來將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外的教育統稱爲社會教育。

由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所謂的教育小說是敘述一個人（或一群人）在教育（含師生關係）環境影響下的發展及成長過程的小說，它具有某種教育和懲戒性質。這是嚴格意義上的教育小說的定義。此外，教育小說作爲小說題材的一種，須具「教育」和「小說」的全部要素和功能。

《歧路燈》由於具備教育和小說的諸要素，且是教育題材與小說體裁兩個方面的有機結合，因此可以確定它是一部名副其實的教育小說。

換一個角度論，如果說《歧路燈》就是這樣一部教育小說的話，那麼我們對時代、作家、文本及以往讀者、研究者的解讀實際上是一種對話——時空距離意義上的新的對話形式，這種解讀已經具有新的詮釋意義。由於每個人對它們的詮釋都存在個體差異性，而展示自己解讀的心路歷程，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部更廣泛意義上的教育小說。

二、教育小說與其他小說的區別

從教育小說的定義中，我們可以確認《歧路燈》爲教育小說。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的研究者都認同這一結論，事實上，不同的研究者從不同的研究視角出發，對於《歧路燈》的題材有不同的定位。我們想確認《歧路燈》爲教育小說，還要廓清它與其他小說之間的區別。

關於小說分類宋代已始，說話之家數即是，如《都城紀事》、《夢粱錄》等均有，在《中國小說史略》中魯迅先生又把明清小說歸納爲神魔小說、人情小說、明之擬宋市人小說、清之擬晉唐小說、諷刺小說、狹邪小說、公案小說及譴責小說等等。但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對《歧路燈》始終未置一詞。